



中国近代大学校园与建筑

蔡凌 著



科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大学校园与建筑

蔡凌 著

科学出版社

元 00.80 (含邮)

(北京) 北京 100070

内 容 简 介

本书在史料汇集与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讨论近代中国大学校园与建筑,其社会、经济、文化的产生机制及历史发展脉络,并整理了近代大学校园规划与建设历程,建筑的风格演变及形式特色;同时分析这些规划手法、建筑语汇所代表的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脉络与象征意义;讨论不同阶层投资者与设计者的文化认同和对建筑美学价值的选择。

本书可供建筑和城市规划专业高校老师、学生阅读,也可供对中国近代建筑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大学校园与建筑 / 蔡凌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03-061649-4

I. ①中… II. ①蔡… III. ①高等学校—教育建筑—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TU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16925 号

责任编辑: 郭勇斌 欧晓娟 / 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师艳茹 / 封面设计: 刘云天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9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7 1/2

字数: 412 000

定价: 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序

《中国近代大学校园与建筑》一书是蔡凌博士在东南大学建筑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出站报告基础上，经过了八年的修改、补充和完善，最终成稿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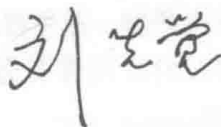
本人作为蔡凌博士在站期间的导师，深感欣慰。

中国近代大学校园与建筑的研究作为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些大学是当代中国许多著名大学的基础，它们的近代建筑成为我国各著名高等学府校园的历史文化象征，在当代中国大学校园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社会文化角色。

该书是国内少有的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大学校园与建筑的专著。这本书对于研究中国大学的发展与成就，能起到促进和参考作用。蔡凌博士除了对国内各大学进行实地调研外，还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档案馆、校史馆，查阅文献档案；后又利用去美国访学的机会，从弗吉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等大学的图书馆、档案馆中获取大量史料。在此基础上，该书厘清了许多中国大学的学术渊源，解决了之前对此不甚了解的一些问题，使得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有价值的成果。

该书不仅是建筑学，同时也是城市规划研究方面，以及城市建设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阅读该书，建筑和城市规划工作者都能从中受益，获得一些新的启发。

该书不仅内容丰富，写作严谨，而且图文并茂，是建筑学术界的一本优秀作品。希望该书能在建筑学术界成为有关学者和同仁的良师益友。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9年3月22日于南京

前 言

本书主要研究了 1840—1949 年中国近代大学校园与建筑的百余年的发展历史。

随着新式高等教育在近代中国萌芽，近代新式大学也应运而生。自此，伴随着教育制度的不断改革，从早期沿用旧有书院、府邸，到后来进行独立规划建设，近代大学校园与建筑有其独特的历史变迁过程，折射出中国近代建筑的产生机制，以及形式与风格的起源与转化。

近代大学建筑在当时的政府、教会及私人等政治、经济力量的推动下，得以展开丰富地建设，并直接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异质文化的碰撞、冲突、转化和融合。实质空间的营造，大学校园与建筑的产生、发展，正是体现这个过程的空间实践。值得注意的是，在营建校园的过程中，近代建筑师们因应了不同的需要，结合东西方建筑文化及其象征表现，运用当时较为先进的技术方法及材料，设计建造了许多不同风格类型的建筑——特殊文化形式的大学建筑。虽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设计、兴建，但并非全然照搬西方建筑形式，更多的是地域性民族形式的创新尝试。显然，近代大学校园与建筑更是一个涉及投资者及设计者的文化认同与意识形态实践的课题。

从社会史、教育史、文化史、建筑史的视野来看，近代大学校园与建筑是中国近代建筑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大学校园与建筑的发展及其引入的社会文化、空间营造变迁研究的课题，实则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本书试图在史料汇集与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讨论近代中国（1840—1949 年）大学校园与建筑，其社会、经济、文化的产生机制及历史发展脉络，并整理近代大学校园规划与建设历程，建筑的风格演变及形式特色；同时分析这些规划手法、建筑语汇所代表的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脉络与象征意义；讨论不同阶层投资者与设计者的文化认同和对建筑美学价值的选择。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由清政府谕各省府州县，将当时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的新式学堂，并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校，它们和教会设立的一批教育程度较高的教会学校，成为近代大学之前身；1912 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对学制进行改革，按照当时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大学分文、理、法、工、农、商、医、教育八科。凡具备以上三个学院的称为大学，但这三个学院必须包括理学院或农、工、商学院之一。不足三个学院的学校为学院。各学院修学的期限，除医学院修业五年外，其余都是四年。本书重点关注近代大学教育的变迁及大学校园的空间营造议题，因此不从狭义角度来看待大学名称问题，本书把大学和学院都一并视为从事大学教育的机构。凡 1949 年前的大学或学院，本书都以“近代大学”称之，不做区别对待。

本书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 近代大学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机制与历史脉络。即讨论 1840—1949 年百余年间中国近代大学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如何开展大学校园建设的过程。

(2) 近代大学校园规划与建设实践。从时间的脉络上考察近代校园规划从无到有，从西方大学校园规划手法的直接引入到对中西文化融合与创新的探索。

(3) 近代大学建筑的风格与形式特色及其风格与形式转化的脉络与象征意义。即讨论投资者与设计者在面对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碰撞的情况下，他们的建筑美学价值观在实质空间营造上的移植、模仿与转化过程。

本书主要从事件、人物等多样化角度进行一些微观结构与小进程研究，揭示现象与其背后多样化的人物乃至历史事件的关联。这些人物，不仅包含通常我们所关注的职业建筑师或是主持设计者，还有参与其中的各种人物和组织；一些历史事件，小到学生和教师的冲突，大到政治动乱与纷争，亦包含着影响建筑进程的潜在因素。本书关注隐含在近代大学建筑的发展过程之中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变化，以期展示建筑与相关的事件共同构成的历史画面，对建筑现象做出全面的解释与阐述。

感谢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学科建设专项资助对本书出版的支持。书中有少量图片，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与图片作者一一取得联系，在此深表歉意并致谢。请相关作者及时与本书作者取得联系，以便按有关规定付酬。

作者

2019 年 2 月于广州

目 录

序	
前言	
第一章 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发展历程	1
1.1 清末大学教育的萌发（1840—1911年）	1
1.1.1 近代大学教育的萌芽（1840—1894年）	2
1.1.2 中国近代大学的建立（1895—1911年）	4
1.2 民国时期近代大学的发展（1912—1937年）	8
1.2.1 民国初期的大学（1912—1926年）	8
1.2.2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大学（1927—1937年）	13
1.3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高校的迁移与调整（1937—1945年）	17
1.4 抗日战争结束后的恢复（1945—1949年）	21
第二章 高等教育制度演变与大学校园近代化	23
2.1 从洋务学堂到大学堂校园	23
2.1.1 洋务学堂校园	23
2.1.2 大学堂校园	24
2.2 大学建制转变对公立大学校园建设的影响	28
2.2.1 “堂—科—门”建制与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	28
2.2.2 民国时期大学建制的更迭	30
2.3 从教会书院到教会大学校园	34
2.3.1 清末教会大学校园	34
2.3.2 民国时期的基督教大学校园建设	37
2.3.3 发展缓慢的天主教大学	41
第三章 近代大学校园规划的三个十年	44
3.1 1904—1914年最早的几所大学规划	44
3.1.1 斯托顿建筑师事务所与岭南大学	45
3.1.2 荣杜易建筑师事务所与华西协合大学	46
3.1.3 科迪·X.格雷戈里与金陵大学	56
3.1.4 茂飞与雅礼大学、清华学校	60
3.2 1916—1926年的校园规划	71
3.2.1 何士与北京协和医学院	71
3.2.2 茂飞的大学校园规划实践	75
3.3 1927—1937年的校园规划	92

3.3.1	F. H. 卡莱斯与武汉大学	94
3.3.2	中国建筑师的校园规划设计	96
第四章	近代大学校园规划的特点	106
4.1	校园选址	106
4.1.1	公立及私立大学选址	106
4.1.2	教会大学选址	109
4.2	校园建筑布局	113
4.2.1	混合的布局	113
4.2.2	分区的布局	114
4.3	美国大学校园规划的中国实践	116
4.3.1	“学术村”式格局	118
4.3.2	布杂式格局	120
4.3.3	布杂原则的中国调适	128
第五章	“西学东渐”下的大学建筑	131
5.1	清末大学堂中的“洋楼”	131
5.2	中国教会大学中的西式建筑	136
5.2.1	殖民地式	136
5.2.2	古典复兴	137
5.2.3	学院哥特式	139
5.3	民国公立与私立大学中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	149
5.4	“装饰艺术运动”与现代建筑运动的影响	159
第六章	“中国传统复兴”建筑	171
6.1	教会大学建筑的本土化努力	171
6.1.1	圣约翰大学的最初尝试	171
6.1.2	本土化形式的多种探索	174
6.1.3	宫殿化倾向与定型	198
6.2	民族意识与民族建筑形式	221
6.2.1	地域性民族形式的探索	221
6.2.2	中国传统复兴的广泛传播	226
第七章	综述：中国近代大学建筑风格的演进	240
7.1	“西学东渐”	240
7.2	“中学为体”	244
插图目录与资料来源		252
参考文献		263
后记		268

第一章 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发展历程

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大学建筑得以兴建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鸦片战争后中国开放通商口岸，自东南沿海地区开始，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各方面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外国教会逐步获得了在中国享有传教自由和兴办各级学校的特权。之后，教会大学的兴建，引入新的校园建筑与文化。另一方面，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传播“西学”和提倡“新教育”的活动中创办洋务学堂，为中国近代大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因此本书以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大学建筑研究的起点。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中国共有近代大学78所：其国立大学13所，省市立大学9所，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20所，还有独立学院36所。在全面抗日战争时期，高等学校大致经历了大迁移、恢复调整和巩固发展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首先接收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高等学校，至1951年底处理接收外国津贴的教会大学的工作基本完成，与此同时，还分期分批接办了私立高等学校。从此，近代大学被统一纳入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

1.1 清末大学教育的萌发（1840—1911年）

近代世界历史形成的实际格局无情地限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发展相对迟滞的中国传统教育的新生，只有在和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接触中才能实现。然而这种文化接触，却是伴随着武力而来，伴随着被侵略的屈辱。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带有“处天之中”强烈自豪感的中国人开始反省从来没有脱离过自我中心轨道的传统经世教育观念。自19世纪60年代起，在清政府统治阶级内部，开展了一场由一些高级官僚主张的“自强”“求富”的学习西方技术的洋务运动。然而，三十多年后的甲午一役，茫茫黄海上的痛苦决战，使洋务派的“富国强兵计划”完全破产。单纯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观念经此一役，暴露出它的短视。因此，维新运动提出其核心主张——制度的变革：变法、变人，认为这才是中国走向明日富强之路的根本。正如梁启超所言：“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①“百日维新”后来虽然宣告失败，但创办新式学堂却成为维新运动唯一被保留下来的一项变革。另外，西方传教士也在传教过程中逐渐转变了观念，重点由传教转向兴办教会学校，并朝着建立高层次教育体系的方向发展其教育事业。

^① 梁启超.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M]/梁启超. 饮冰室文集类编（上）. [出版地不详]: 1902（光绪壬寅年）: 11.

清末大学教育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向近代化的转变。

1.1.1 近代大学教育的萌芽（1840—1894年）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对战争失败进行检讨，把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当作拯救中国的最佳途径。“洋务派”认为精习“西文”、学习西方的“测算之学、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及“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就能掌握西方人的长处，从而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

为此，一批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教学内容的新式学堂，开始在中国出现。这批学堂大致可归纳为三种类型，即方言学堂，军事学堂和实业、技术学堂。其基本情况见表1-1。

表 1-1 洋务运动中开设学堂概览

学校类型	学堂名称	设立时间	地点	议建人	沿革
方言学堂	京师同文馆	1862年	北京	奕訢	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上海广方言馆	1863年	上海	李鸿章	1905年改为工业学堂
	广州同文馆	1864年	广州	瑞麟	—
	新疆俄文馆	1887年	新疆	刘锦棠	约1905年改为高等学堂，1908年复设
	台湾西学馆	1888年	台湾	刘铭传	1891年停办
	珲春俄文书院	1889年	吉林	长顺	—
	湖北自强学堂	1893年	武昌	张之洞	1903年改为普通中学
军事学堂	福建船政学堂	1866年	福州	左宗棠	—
	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	1874年	上海	李鸿章	1881年改为炮队营。1898年与上海广方言馆并为工艺学堂
	广东实学馆	1880年	广州	张树省	—
	天津水师学堂	1880年	天津	李鸿章	1900年毁于八国联军炮火
	北洋武备学堂	1885年	天津	李鸿章	—
	黄埔鱼雷学堂	1886年	广州	张之洞	1904年并入广东水陆师学堂
	广东水陆师学堂	1887年	广东	张之洞	1912年改为黄埔海军学校
	昆明湖水师学堂	1888年	北京	奕訢	甲午战争后停办
	江南水师学堂	1890年	南京	曾国荃	1909年改为南洋海军学堂，1911年停办
	威海卫水师学堂	1890年	山东	丁汝昌	1894年甲午战争中解散
	旅顺口鱼雷学堂	1890年	旅顺	—	1894年甲午战争中解散
	江南陆师学堂	1895年	南京	张之洞	1896年附设铁路学堂
	直隶武备学堂	1896年	浙江	袁世凯	—
	湖北武备学堂	1896年	武昌	张之洞	—

续表

学校类型	学堂名称	设立时间	地点	议建人	沿革
实业、技术学堂	福州电报学堂	1876年	福州	丁日昌	—
	天津电报学堂	1880年	天津	李鸿章	—
	上海电报学堂	1882年	上海	—	—
	金陵同文电学馆	1883年	南京	左宗棠	—
	两广电报学堂	1887年	广东	张之洞	—
	台湾电报学堂	1890年	台湾	—	1891年停办
	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	1892年	武昌	湖北省矿务局	—
	天津医学院	1894年	天津	李鸿章	1915年改为海军医学校, 1933年停办
	山海关铁路学堂	1895年	天津	津渝铁路公司	1900年解散
	江南储才学堂	1896年	南京	张之洞	1898年改为江南高等学堂
	湖北农务学堂	1897年	湖北	张之洞	—
	南京矿务铁路学堂	1898年	南京	胡云台	—

资料来源: 吴宣德(1997)

三十多年兴办的洋务教育, 对中国传统教育而言是个突破和重大改革。虽然 1894 年的甲午战争, 宣告了急功近利的洋务教育存在缺陷, 但洋务教育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的变化, 客观上传播了近代西方科学技术, 为创建中国近代的大学教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如果说洋务教育是中国面临外来侵略的生存危机之下不得已由官方主导的教育改革, 那么近代从《南京条约》的签订开始, 到后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有另一支力量借机逐渐介入中国的教育体系, 那就是外国教会与传教士。

鸦片战争以前, 由于清政府禁教, 传教士们不能在中国境内自由传教办学, 只能在中国“外围”活动。^①鸦片战争过后, 传教士们的活动开始“合法化”, 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先是开辟通商口岸, 允许租赁土地、房屋, 建立租界, 为各国提供传教办学的前提条件; 而后则进一步保障传教办学的自由^②: 所有签约国传教士来华办学, 应受条约保护, 不准中国人“欺侮”或“干扰”; 传教士如同经商之外国人一样, 不仅可以在五口通商地传教办学, 也可以到内地传教办学, 中国政府官员不得横加干涉; 外国人享有在华租地, 建房充作教堂、医院、学校、栈房等自由权利。^③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 设立于 1836 年的马礼逊学校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s School,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最早的较正规的学校), 即于 1842 年 11 月由澳门迁往香港, 成为香港开埠后的第一所教会学校。天主教会亦在上海设立徐汇公学, 成为其在华创办的第一所有影响的学校。

① 1818 年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在马六甲 (Malacca) 创办的英华书院 (Anglo-Chinese College), 被很多教育史研究者认为这是传教士在中国办学的开始。

② 具体条款参阅 1844 年《中美厦厦条约》第 17 条; 1844 年《中法黄埔条约》第 22 条; 1858 年《中俄天津条约》第 8 条; 1845 年《中英上海租地章程》第 10 款; 1858 年《中美天津条约》第 12 款; 1858 年《中英天津条约》第 8 款; 1858 年《中法天津条约》第 13 款; 1860 年《中法北京条约》第 6 款; 1868 年《中美华盛顿续约》第 7 条; 等等。

③ 高时良. 中国教会学校史[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19.

教会学校凭借不平等条约强行设立,在中国传统封建教育主体中楔入了西方的教育因素,而且从时间上看,是比洋务教育更早的以学校形式传播西学的组织。

教会学校发展的重点亦逐步发生着转变,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及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创立的教会学校,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教会学校逐渐突破初级阶段的教育。前期那种认为教会只需办初等学校,以争取更多的异教徒男女孩童加入基督教的策略,或是单纯的“辅助传道”“养成牧师教师”,很明显已经不能满足帝国主义的需求:一是为它们培养在华企事业服务的高级人才;二是培养直接或间接为帝国主义政治服务的高级官员和社会领袖。这种策略上的转变,促使近代新式教育向着更高层次发展,教会势力由此获得新的扩张契机。

1877年,在上海召开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会议就教育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教育与传教的关系上。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的发言很能代表主张办学一派的这种观点:“基督教传教士为何要努力培养在中国这场注定要出现的变革中起带头作用的人才,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如果能正确控制和指导,就会为基督教取得普遍胜利开辟一条光明大道。”^①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一批教会学校的创设或发展,成为后来的教会大学的基础与前身,如1871年武昌的文华书院、1888年广州的格致书院、1888年美以美会创办的南京汇文书院、187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等。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来华传教士狄考文于1864年在山东创办登州蒙养学堂,在1877年将其改名为登州文会馆(Tengchow Boy's High School)。19世纪80年代初,在狄考文的努力下开始使用“Tengchow College”(登州学院)这一英文名字。

中国近代大学就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中萌芽了,一类是由清政府创设,“师夷长技以制夷”;另一类由教会开办,目的是“基督教拯救中国”。这两种势力,成为清末大学教育的主导力量,贯穿于1895—1911年的大学发展过程之中。

1.1.2 中国近代大学的建立(1895—1911年)

1895—1911年是清末中国近代大学正式建立的关键时期,主要有两方面的活动:近代新式大学——大学堂的创立,以及教会学校进一步向大学发展。

甲午战争战败迫使中国各派人士重新积极探索救国之路。洋务教育虽然对中国传统封建教育是个突破和重大改革,但其植根于“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②的办学指导思想下的语言、军事、工业技术教育在甲午战争后也引起洋务派自身的反省。因为这种急功近利的教育结果造成了“且皆未能悉照西洋认真学习……专精研习曾无一人,何得有杰出之士,成非常之才耶?”^③与此同时,维新派在主张改良政体的同时,

^① MATEER C W. 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s to Education[M]//Record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7: 177.

^② 冯桂芬. 采西学议[M]//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887.

^③ 郑观应. 西学[M]//魏源. 皇清经世文编: 第二卷. [出版地不详]: 1826, 转引自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M].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0: 7.

亦认为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不良、学术落后，救亡之道应从改良教育入手，并明确指出洋务教育的严重不足，主张“废科举，兴学校”。他们批评洋务派的西学“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①，洋务派“西学”不彻底，“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认为应全面系统地学习“西学”，学习西方的办学模式，建立起新的教育制度。

在 1895 年，正处于对过去 30 年洋务教育进行利弊总结、评论长短之时，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新式大学诞生了，它便是由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堂（1895 年 10 月 2 日光绪皇帝准旨开设天津北洋西学学堂，第二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堂自创办之日起，就有别于以往建立的各式专科学校，而以美国大学为模式，以“西学体用”为办学方针，全面系统地学习“西学”。创办者盛宣怀在洋务实践中深切体会到新式人才的重要，因而在创办伊始就提出与中国以往所有各类学校完全不同的办学方针，那就是：“所有学堂事务，任大责重，必须遴选深通西学体用兼备之员总理，方不致有名无实。”^②故而，除学校所需的图书、设备等尽量从美国购置外，还聘请了美国教育家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为总教习。中国的大学堂里出现洋教习，亦从北洋大学堂开始。

在北洋大学堂创办的第二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时任津海关道、太常寺少卿的盛宣怀再次发起创办大学堂的奏议，并获朝廷批准，向招商、电报两局每年集捐银 10 万两，在上海徐家汇创办了南洋公学。该校分上、中、外、师范四院。其中，上院属大学性质，中、外、师范各院则分别相当于中学、师范附属小学和师范专科学校。1898 年还设立了译书院。

此时，京师大学堂还处于建议和筹备阶段。1896 年 6 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给清政府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堂”。李端棻的这个奏折据传出自梁启超的手笔，自然反映了维新派的主张。而且李端棻的奏折最早提出创立近代中国新学制系统：首倡设立京师大学堂、省学和州府县学等大、中、小三等学堂。

在此之后一直到 1898 年年初，管学书局大臣孙家鼐、康有为、御史王鹏运先后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但一直到 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皇帝下《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才正式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③。在它的第一个办学章程中，即明确规定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各省学堂皆归京师大学堂管辖。

戊戌变法之后，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几乎全被废除，唯独京师大学堂没有废止。但源自维新派全面学习西学等变法主张而诞生的京师大学堂，其办学宗旨与维新派的理想已相去甚远。

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明确规定京师大学堂的办学宗旨：“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④这一宗旨一直贯彻到清朝帝制的结束。除了教学方针和内容方

① 梁启超. 学校余论[M]//陈元晖. 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37.

② 盛宣怀. 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M]//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137.

③ 梁启超. 戊戌政变纪事本末[M]//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42.

④ 高时良. 中国教会学校史[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338.

面的变化，京师大学堂的规模也较原计划大为缩小，仅设仕学院，让举人、进士出身之京曹入院学习，同时附设小学。故而京师大学堂又回到了传统教育培养目标单一的老路，即学校仅为培养官吏之场所。学堂原定招生 500 人，但至该年 12 月份开学时，学生不足百人。办学经费随着清政府国库空虚也一再被减少。1900 年夏，义和团进入北京，学堂停办，同年 8 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位于地安门内马神庙和嘉公主旧宅的临时校舍先后被俄、德侵略军占据。直到 1902 年京师大学堂才被恢复，并由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在张百熙主持校务期间，大学本科被暂停，转而设立预备科、仕学馆、师范馆、藏书楼、译书局和编书处。1903 年与京师同文馆合并，改为译学馆，并设立医学实业馆，京师大学堂才有了较大的拓展。这样的机构设置一直保持到 1909 年。1910 年，京师大学堂开始筹办分科大学。严格地说，整个京师大学堂在清末没有培养出一名正规的大学本科毕业生。^①

京师大学堂的创立，是我国近代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虽然它并不是中国政府创办的第一所近代大学，但其处于京师的示范作用，为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末建立的具有近代高等教育性质的学校，还有一所利用山西教案赔款之 50 万两白银创办的山西大学堂。当时负责接受赔款的英国人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提议山西巡抚岑春煊将前身为山西最高学府全德堂的山西大学堂与他筹办的中西大学堂合并办理，创立新的山西大学堂。1902 年正式开办的山西大学堂分为两个部分：一部为中学专斋，讲授史论、经义；另一部为西学专斋，完全沿用英国的整套教学内容。第一阶段三年，是预科；第二阶段四年，是专科，相当于四年制的大学本科教育。

截至清朝灭亡时，由中国人创办的近代大学仅有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上院）、京师大学堂及山西大学堂。这四所学校在成立之初，办学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学体系并不统一，存在较大差异。这客观地反映了清末近代大学的产生背景，即 19 世纪末维新派与顽固派、洋务派，西学与中学，科举制度与西方近代大学教育的较量，代表着中国近代大学自诞生起就面临的极其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

京师大学堂恢复及山西大学堂开办的 1902 年，还是我国大学分科分系制度的开始。这一年 8 月，由张百熙主持的一整套学堂章程——《钦定学堂章程》，由清政府批准颁行，时称“壬寅学制”。它是我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颁布规定的完整学制。^②按照其中的《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教育分大学预备科、大学专门分科、大学院三级，总称为“大学堂”，以在京师设立为原则。“大学专门分科”仿日本体制，大学分科，科下分目，共设七科三十五目。^③在各省自行设立的高等学堂学历等同于大学预备科。次年，张之洞、荣庆、张百熙奉命重订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颁布“癸卯学制”。这次修订，全面贯彻了张之洞 1898 年所著《劝学篇》中反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大学分科除原有七科外，增设了经学科，下设周易、尚书、春秋、左传等十一目，突出经学的地位。另外，

① 金以林. 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27.

② 《钦定学堂章程》共分五类：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养学堂章程。

③ 七科为政治科、文学科、格致科、农业科、工艺科、商务科与医学。

较大的改动是在京师专设总理学务大臣，管理全国学务。从此，国家教育行政管理从过去的京师大学堂兼管中分离出来。这使得京师大学堂舍去了之前的双重身份，成为较纯粹的高等教育机构。“癸卯学制”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时期。

另外，在1895年直至清末1911年的这段时间里，教会逐渐确定了教会教育工作的目标，尽管主张办学的人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只需办初等学校，以争取更多的异教徒男女孩童加入基督教；二是办高等学校，培养政治上足以控制中国前途命运的人。随着外国对华侵略形势的发展，确定了主张发展高等教育的人获得胜利。

在1890年举行的“第二次在华传教士大会上”，狄考文详细阐述了创办教会大学的必要性，“不论哪个社会，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有影响的人，他们会控制社会的情感和意见。对传教士来说，全面地教育一个人，使他能在一生中发挥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巨大影响，这样做，可以胜过培养半打以上受过一般教育但不能获得社会地位的人。”他强调：“我们必须培养受过基督教和科学教育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任何一个精通西方科学，同时又熟谙中国文化的人，在中国任何一个阶层都将成为一种有影响的人。”^①上海圣约翰书院院长卜舛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则更加直白：“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就是设立在中国的西点军校……当被问到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从何处可以清楚看出其力量来源时，让我们不只是指出中国有那么一队较英勇的本地和国外的福音使者，而且还应指出我们的教育机关，正在训练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他们在将来要对中国同胞施加最巨大和最有力的影响。”^②就在这次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的会议上，与会代表决定，将1877年由在华各教派联合组成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从单纯编辑出版教科书扩展为对整个在华基督教的教育进行指导。^③教会学校开始将目光移向高等教育。

此时，在前期洋务派探索新式教育的基础之上，清政府终于创办了近代第一批四所大学堂。教会学校的工作也向更高层次的高等教育发展，教会大学慢慢成形，虽然这些学校水准不齐、规模不一，分合不定，有的甚至旋生旋灭，表现初始阶段的粗放性，但其中的一些大学，后来发展成为稳定和正规的基督教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大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190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举行对华传教一百年纪念大会，会上通过的一条决议，要求英美差会大力支援在中国发展中、高等学校，“我们要通过差会力求母会帮助发展现有的中、高等学校，并在尚无此类学校的地区开设新学校”^④。同时，为使教会教育达到更高水平，各教派、各学校的联合，特别是高等学校的联合，也提到日程上来。教会大学因此有了三种办理形式：由一个差会独办，几个差会合办和英美差会联合办理。

①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G].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458-459.

②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G].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496.

③ 金以林. 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99.

④ 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20.

1.2 民国时期近代大学的发展（1912—1937年）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中国近代大学也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首先，清末高等教育彻底结束，临时政府通过几次大的学制改革，逐步确立起比较完整的新式教育体制。其次，开始出现除教会大学之外的私立大学，形成公立、私立、教会大学的大学组合模式。最后，虽然有学制改革的反复及国内政局的影响，中国近代大学在学校数量方面有了显著增长。不管是何种类型的学校，在这一阶段都处于大量校园建设活动开展时期，校园规模、格局及建筑均基本定型与完成。

1.2.1 民国初期的大学（1912—1926年）

1. 公立大学的普及

民国初年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新规程，建立了新的学制系统。但因民国初年政治动荡，战乱不止，北京政府^①教育部废除了各地设立的高等学堂，准备分别在北京、南京、武汉、广州设立四所教育部直属国立大学的设想，除国立北京大学的计划因继承了清末京师大学堂而实现以外，其他大学计划都没能实现。中国的高等学校还是以专门学校和高等师范教育居多，近代大学较少。据1917年全国高等教育统计：当时共有高等院校80所，其中高等师范学校和专门学校72所，而分科大学仅8所。^②专门学校主要是由清末创办的高等实业学堂和法政学堂演变发展而来，高等师范学校的前身是清政府在全省设立的优级师范学堂。此时，中国的国立大学仅有3所，即北京大学、天津大学与山西大学。除教育部直属国立大学之外，公立高等专门学校还有由其他部局设立的国立高等院校，如交通部所辖的北京邮电学校、铁路管理学校、唐山工业学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前身为南洋公学）；北京政府外交部所辖的俄文专修馆和清华学校；北京水利局所辖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按照中华民国教育部1912年颁布的“壬子学制”，清末在各省建立的高等学堂纷纷停办，根据新学制将原有学堂陆续改造或创办新的高等专门学堂。之所以在民国成立后的前期，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大学仍然屈指可数，除却清末高等教育发展迟缓及政局动荡的原因之外，“壬子学制”为“大学”设置了一定的门槛，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须合于下列条款之一，方得名为大学：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或一科者。”^③因为办学必须经历必要的时间，政权的更迭并不会使得高等学校立即扩充规模，达到如“壬子学制”所要求的学科数量，这就导致了大学数量仍然较少。

随着五四运动的开展，欧美教育制度逐步传入中国，影响越来越大，先前受日本教育体制影响较多的1912年“壬子学制”又面临着改革。1922年9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在济

①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窃夺政权，5日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设北京。

② 第五次教育统计（一九一七年）[M]/陈翔林. 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 上海：太平洋书店，1940：270-272.

③ 教育部中国教育年鉴编审委员会.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M]. 上海：开明书店，1934：24.

南召开学制会议，议决《学校系统改革案》，于11月以北洋政府大总统名义公布，这就是所谓“新学制”或“壬戌学制”。

“壬戌学制”有两项重要内容对大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是大学校设数科，或一科，均可。其单设一科者称某科大学。二是取消大学预科。故而，1922年后，根据新颁布的“壬戌学制”，专门学校地位逐步提高，许多专科学校及省立专门学堂纷纷升格为大学，“于是引起专门学校的升格运动”^①。此后，“国立大学既有增加，私立大学也增加不少，而各省有各设一省立大学的趋势”^②。仅据1924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出版的《中国教育统计概要》显示，全国高等学校在当时已多达125所。自1917年全国高等学校统计至新学制颁布的一段时期内，公立大学开始有显著发展。这期间定名的著名大学有：1920年的交通大学；1922年在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创立的国立东南大学；1923年7月成立的国立北京师范大学；1923年9月成立的武昌师范大学；1921年成立的国立商科大学。1922年新学制出台后，根据北洋政府教育部1922—1927年的统计（表1-2），大学的数量在短短几年内稳步上升。

表 1-2 1922—1927 年中国公立、私立大学数量一览表

年份	大学数量		年份	大学数量	
	公立大学	私立大学		公立大学	私立大学
1922	10	9	1925	34	13
1923	19	10	1926	37	14
1924	30	11	1927	34	18

资料来源：周邦道.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M]. 上海：开明书店，1934：445；孙邦正. 六十年来的中国教育[M]. 台北：正中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4：419.

这阶段定名的省立大学有：1926年省立山东大学，1926年省立湖南大学，1922年中州大学，1923年广东省立法科大学，1924年广东公立医科大学，1924年广东大学（1926年7月17日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1923年东北大学。这时期定名的大部分大学是经过专门学校合并、改组后成立的。

2. 私立大学的兴起

清末的大学，是不允许私立的（教会大学除外）。故而，由中国人创办的私立大学出现在民国以后。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废除了清政府颁布的只允许私人兴办中等以下学校，高等学校全由公办的规定。办学权限从此被放开，私人可以开办除高等师范学校以外的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西方势力在中国有所放松，民族工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再加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实业界与教育界人士纷纷兴学。中华民国建立后的15年间（1912—1927年），是近代中国的私立大学从无到有、逐步发展的时期，其间创办了许多著名学府。私立大学主要分布于京津及东南沿海一带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见表1-3。

① 金以林. 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84.

② 陈翊林. 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M]. 上海：太平洋书店，1940：268，279.